

西方译论研究: 线索、问题与方法

黄朝阳, 张冬梅^①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以丰富的实例为基础,从研究线索、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探讨抵达西方译论研究之堂奥的路径,理出了西方译论研究的四条线索,论述了在西方译论研究中该如何突破传记式研究模式对事实性知识的平面呈现,如何提出问题、学会反省的怀疑,如何通过知识系谱法、语境还原法、纵向梳理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达到对西方译论的透彻理解,从而最终实现推进和超越。

关键词:翻译学;西方译论;传记式研究模式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美丽的阿里阿德涅公主送给勇士忒修斯一只会滚动的线团,这只线团引导忒修斯通过多歧而混乱的路进入迷宫,杀死了怪物弥诺陶洛斯,然后,忒修斯又由线团引导从迷宫中走出。这个神话故事具有原型的意味,它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尚未发展到对外物和自我有较高把握力的时代,人类对方法的感性化理解和渴求。在古希腊语言里,“方法”这一概念是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遵循某一道路”,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直观的方法观念。^[1]从 20 世纪 50 年代始,西方翻译理论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超越和震荡,在深度与广度上迅速扩展,新的观点和流派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多元化翻译理论景观。面对西方译论的众声喧哗,我们该如何“倾听”,如何提问,如何通过研究抵达认识,通过认识学会反省的怀疑,通过怀疑、批判从而实现推进、超越?本文从研究线索、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入手,为抵达西方译论研究的堂奥寻找引导路径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一 研究线索

面对众声喧哗的西方译论,我们首先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在纷繁复杂中理出线索,准确定位自己的研究课题。在西方译论这个研究领域里选择课题,可从以下四个向度着手。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往往是以一个向度为主,四个向度相互交叉,互为经纬。

一是以“时间”为线,截取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某个历史阶段进行研究。西方译论的发展历时几千年,留下了丰富的资源。“一方面,历史的积累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向前发展了的事物又需要回过头来重温已经走过的历史,以不断从历史的渊源和积累中寻找继续向前发展的养分

和动力”。^[2]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编著的《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3]就是这类研究的典范。全书共分 6 章,借用勒菲弗尔的“先驱”、“开拓者”、“大师”、“门徒”的分类,颇有见地地梳理了现代西方译论的发展脉络,内容涵盖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起源于 80 年代的文化转向,90 年代的跨学科研究、实证研究转向、全球化转向,翻译学在新千年的发展现状,当下的困境和难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结构清晰,文字晓畅,以时间为线系统明了地分析和评述了当代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和转向,对翻译研究这一年轻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

二是以“流派”为线,研究某个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如多元系统学派、功能目的学派、操纵学派等等。此类研究旨在探讨某一具体译论流派的生成背景、理论基础、洞见与不见、可能影响和发展趋势等。当代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赫曼斯教授编著的《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4]一书就是介绍和评述描写——系统派理论的基础性著作。全书除引言外共分 12 章,以先总后分的方式展示了一幅描写——系统理论的全景图。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追溯该派观点的理论之源,概括该学术共同体共同的理论导向和信念,为该派理论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第二部分(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和第三部分(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分别从“描写”和“系统”两个向度对该派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动态的梳理与分析。第三部分(第十一章)辩证地分析来自该学派之外的批评。第四部分(第十二章)指出描写——系统范式今后的发展方向。他对该派理论源流的动态梳理为我们展示了该派学术肌理日益丰满、学理基础日趋扎实、学术品格渐臻完善的动态发展图;他对该学术共同体的“主干”和“枝蔓”、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个性和共性的全面论

① 收稿日期: 2008-07-07

作者简介:黄朝阳,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张冬梅,女,湖南邵东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述, 为我们描画了一幅空间维度上的全景图; 他对该派理论成就的客观总结、对其缺陷的深思熟虑的批判、对未来方向的深入思考更使该书具有了关注现实的学术品格和难以企及的理论深度。不过, 若能结合该派理论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 把该派思想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 读者的理解将更加透彻, 论著也会更加丰满。

三是以“人”为线, 研究西方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等的翻译思想。祝朝伟的《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5]就是一例。该书从目的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总结了庞德的翻译思想, 并将其与现代中西翻译理论进行比较论证, 在庞德翻译思想与现代翻译理论的经纬交织、纵横交错中理解庞德翻译思想, 在中美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探索庞德翻译的意义。该书既有翻译理论的系统梳理, 又有哲学、美学、诗学以及文学主张的溯流探源, 既有宏观的理论论述, 又有详尽的个案研究, 为以“人”为线的翻译理论研究树立了较好的典范。

四是以“关键词”为线,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某一主题或关键词, 如译者、主体性、对等、操纵、规范等等。无论是作为整体的西方译论史, 还是某个理论家或理论流派, 其思想精华常常凝聚在几个核心概念即关键词中。学术推进的前提是学界对自身所使用的基本术语、概念和范畴的清晰把握, 而非任其先验自明地出没于研究之中。对关键词的考辨是梳理和把握西方译论的有效途径。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刘小刚的博士论文《创造性叛逆: 概念、理论与历史描述》^[6]针对目前创造性叛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采用理论阐发与历史描述相结合的方法, 在大量文本对读的基础上, 分析、描述了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内涵、创造性叛逆在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形态以及在译语语境中的文化意义, 可算是以“关键词”为线研究翻译理论的优秀个案。

二 问题意识

无论是以“时间”为线, 还是以“人”、“流派”或“关键词”为线, 要通过研究抵达认识, 通过认识学会反省的怀疑, 通过怀疑、批判从而实现推进、超越, 都需要我们打破那种拘于对现存材料的转述和阐释的传记式研究模式, 因为这种传记式研究模式停留在为读者提供一种事实性知识, 然而单纯的事实性知识本身却不能决定理论的意义, 对事实性知识的平面呈现亦无法为西方译论研究带来应有的学理深度和力度。推进、超越和创新始于问题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能否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能否有所创新的关键所在。善于发现问题、清晰地提出问题是科研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在西方译论研究中, 问题不仅是引导我们学术研究的指挥棒, 还是推动我们引介、阐释、改写和移植西方理论的内在逻辑秩序和文化立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译学界有太多的西方思潮走过, 每种思潮最初都给人以希望和承诺, 以惊人的力量给原有的知识状况带来巨大的冲击。面对西方译论的丰富资源, 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跟进, 一拥而上, 似乎它们是万能钥匙,

能解决所有问题、澄清所有疑点, 而是定下心来, 探讨这个观念真正引发的那些问题, “在可以应用、可以拓展的地方, 应用它、拓展它; 在不能应用、不能拓展的地方, 就停下来。”^[7]

带着一种认知世界、解释世界的冲动, 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在翻译这一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交互作用的文化场所中辨权力操纵或隐或显的运行机制, 宣称: 从译入语文学的立场来看, 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操纵。环绕在原作(者)身上的神一般的光辉迅速黯淡, “忠实”、“对等”等传统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也被解构。“等值和透明的翻译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尽管这种思想在我们思考和谈论翻译的过程中已经根深蒂固”, ^[8]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赫曼斯如是说。操纵学派以其福柯式的知识考古视角为翻译研究走出传统规范性研究的桎梏提供了可能, 同时也以其或彰显或隐含的消解规范的危险为翻译研究埋下了不安的种子, 从而在惊醒“迷梦”、俘获人心、引来追随者无数的同时亦不免为人所批判和诟病。不过, 追随也好, 批判也罢, 真正的对话产生之前提是对话双方站在同一个思想平台上。缺少对关键问题的认真清理, 热闹总是表面的。何为“操纵”? 它是个什么性质的概念? 这个概念解决了哪些问题, 又引发了哪些问题? 对它的有效批判应该在什么思想视野和逻辑框架内展开? 何为“忠实”、“对等”, 它们是什么性质的概念? 对它们的有效批判应该在什么思想视野和逻辑框架内展开? “操纵”为何批判“忠实”、“对等”, 又是如何批判“忠实”、“对等”? “操纵”是否旨在消解“忠实”、“对等”, 又能否消解“忠实”、“对等”? 对以上问题的追问是我们建立起更坚实广大、更有肺活量的知识场域, 避免隔靴搔痒、批判错位的前提。

三 研究方法

提炼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后, 还需要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在文学创作中, 题材选择创作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 研究对象选择研究方法。在西方译论研究这个领域里, 以“时间”为线, 以“流派”为线, 以“人”为线, 以“关键词”为线的研究分别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 但共通之处是主要的。现以西方译论流派研究为例, 说明西方译论研究的主要方法。

1. 知识系谱法

“理论是有其根源的, 理论也是有其‘伟大的传统’的, 理论不是三两个人精心策划的骗局”。^[9]知识系谱法是对西方译论刨根问底的寻思, 是对西方译论谱系传承、演进路数的梳理, 是对西方译论知识图谱的勾勒。重溯谱系、清理谱系可以让我们从思想的源头、从理论的制高点看清西方译论的内在原理。例如, 操纵学派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把人从“忠实”、“对等”的迷梦中惊醒, 并迅速俘获人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翻译研究的中心, 掀起一股解构“忠实”神话的热潮。可是, 究竟何为“操纵”, 它缘何具有如此大的感召力和颠覆力, 它为何要解构“忠实”, 它又是如何解构“忠实”, 这种解构是否有效, 在什么意义上有效? 脱离该派理论的知识系谱, 忽视该派理论的内在逻辑, 割断该派理论的精

神传承,上述问题就不可能澄明。

2 语境还原法

对西方译论除了重溯谱系之外,还需要不断地把它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以避免理论和观念的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把事实不断抽象化、去脉络化的结果。正如西奥·赫曼斯在《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中所论述的,我们要想公正地对待历史的复杂性、透彻地理解过去的翻译思想,就必须不断地把这一思想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随着背景的置入,翻译思想就鲜活了。理论的移植关键在于语境的适配问题。西方的译论话语本身是什么?产生于何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这种理论是否与中国的现实适配,它在何种层面上可以被重新语境化并成为把握中国现状的资源?研究西方译论,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可忘记该理论滋生的土壤和环境;借用西方译论,亦不可忘记我们自己的土壤和环境。

3 纵向梳理法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可能外在于时间线性而独立于历史之外。西方译论的研究,无论是以“史”为线,以“派”为线,以“人”为线,还是以“关键词”为线,都不能脱开纵向的时间线性上的考察和梳理。如西奥·赫曼斯在《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中首先追溯了该派观点的理论之源:麦克法兰“诊断式而非劝告性”研究方法的提议、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学理注入、以及比利时、荷兰、捷克学者的早期贡献,然后从“描写”和“系统”两个向度对该派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动态的梳理与分析,内容涵盖霍尔姆斯、佐哈尔、图里、切斯特曼、勒菲弗尔、杜尔斯特、朗贝尔、布迪厄、卢曼等人的理论贡献,为我们展示了该学派学术肌理日益丰满、学理基础日趋扎实、学术品格渐臻完善的动态发展图。

4 比较研究法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助于研究者拓展思路,扩大视野,消除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增加研究深度。根据比较过程中参考体系的不同,比较可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种基本形式。西方译论研究中的纵向比较是指以时间阶段为座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西方翻译理论思想之间、或同一译论流派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进行比较,从而追溯西方译论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了解其来龙去脉和历史变迁,推测其发展方向。

横向比较是把处于同一时间平面的西方译论或中西译论作横断面的静态比较,由此达彼地得出新的认识结论。西方翻译理论流派或兴衰更替,或同时共存,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呈现为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在纵向和横向互相渗透、彼此交织的参照体系下进行比较,对深入一层地辨明某一特定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特征、准确定位其贡献与不足是必要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翻译研究的多学科性、开放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西方译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发展趋势,以及后现代语境下西方译论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革新性、语言上的晦涩性等特点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和方法论储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的探讨旨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译界同仁的响应,大家共同努力,为抵达西方译论研究的堂奥寻找引导路径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参考文献:

- [1] 朱自强.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思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80-83.
- [2] 谭载喜.两千年翻译家的心路历程——评道格拉斯·鲁宾逊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J].中国翻译,2006(5):5-8.
- [3] SnelHombly Ma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 points? [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6.
- [4]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5] 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6] 刘小刚.创造性叛逆:概念、理论与历史描述[D].上海:复旦大学 博士论文,2006.
- [7] 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
- [8] 赫曼斯.翻译的再现[M]//谢天振.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20.
- [9] 汪民安.我为什么迷恋理论[J].外国文学,1999(5):43-46.

(责任编辑:文爱军)